

文化中国
天地日新



中国人的宇宙观

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天道与人道相互感应。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可以体认对「天人之际」这个问题的普遍关切。

黄俊杰

主编



黄山书社

中国人的宇宙观

主编 | 黄俊杰

本书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授权出版发行简体字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的宇宙观 / 黄俊杰主编. ——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12 (文化中国丛书)
ISBN 978-7-5461-2475-9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世界观 - 研究 - 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5239号

中国人的宇宙观

黄俊杰 主编

出版人: 左克诚

责任编辑: 郑实 刘翔

责任印制: 李磊 赵彬

装帧设计: 范晔文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 230071

策划: 香港三联书店北京工作室

发行: 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电话: 010-6551362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 010-61202350

开本: 710×1050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04 千字

版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1-2475-9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林载爵

这一套“文化中国”丛书原来是以“中国文化新论”之名，于1982年10月在台湾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总共12册，将近4000页，约400万字。这套丛书讨论了10个主题，包括：文明的根源、思想、文学、科技、制度、经济、学术、社会、艺术、宗教礼俗。以118个题目全面性的讨论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各个层面，组合成一幅比较完整而丰富的中国文化图像。撰写者一共96位，网罗了当时年龄约30到40岁的青年学者，反映了1970年代以来台湾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的反省与思考，构成了中国文化再诠释的新篇章。这些学者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几乎都位居台湾学术界与文化界的重要位置，当年所发表的论点今天仍然具有新意，可以提供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视角。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在受到西方文化长期的冲击以及连带对传统文化进行无情的批判之后，好不容易终于体认到传统与现代是连续性的整体，不可分割断绝。因此，一部超越传统的论述，适合于当时处境与需要，又有系统的中国文化史论著，显得十分迫切。其次，中国文化在1970年代的华人世界需要重新被检视，而台湾则是一个恰当的

地方。台湾的学生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在大学又接受了西方式的学术训练，西方汉学家或台湾出身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的历史学者，不断在台湾传播新的观念与思维，他们给台湾学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到1970年代，这样一批受到西方式现代教育熏陶，对传统中国文化又有新见解的年轻学者已经在台湾出现，成为台湾学术界的一股新兴力量，他们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自然有着不同的视野与不同的解释。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将他们集合起来，总体呈现一个全然有别于过去的中国文化的新观点与新解释。

于是，《联合报》的创办人王惕吾先生以他所设立的“文化基金会”资助了这个庞大的出版计划，目的就是要“提供一部丰富新颖、流畅可读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撰述者之所以以年轻一代的学者为主，最重要的原因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呈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三十年台湾文史教育的成果，并且深信年轻一代学者以其所吸收的西方知识、所接受的近代治学方法训练，必能对传统文化提出新的解释观点。

从历史背景来看，1975年是台湾思想发展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林毓生教授首度返台任教，开启了一批想要获得更精密的思想方式的青年学生的视野。他在这一年的5月发表了一篇长文：《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点燃了沉闷气氛下青年学生重探狂飙年代的兴趣，与领会思想问题的不同讨论方式。同年年底，余英时教授发表了《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文章中深入而前所未见的观点，让青年学生发现思想的新世界，这个世界辽阔无边，只要运用理智的思考与分析，加上一些想象力，便可展翅飞翔，一股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开始出现。

隔年，1976年，余英时在《联合报》副刊上陆续发表《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术发微》等文，为当时争论不休的“专制”问题提出了中肯而又有说服力的解释。9月，余英时将上述文章及其他论著结集为《历史与思想》，由联经出版，这是余英时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产生极

为广泛的影响。

不论林毓生或余英时，在讨论问题时都不时引用当代西方学者的观点，对台湾青年学生带来极大的刺激。此后，翻译现代思想名著成为几家出版社的共同职志，知识青年在这方面所表现的求智渴望，是1970年代末期台湾文化界极为突出的现象，这是一个思想燃烧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中，知识青年一方面向西方看，一方面又回望中国传统文化，企图让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受到批判之后赋予新的解释，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中国文化新论”就是这个组合的产物。

这套丛书的编撰过程也有其新颖之处。一般丛书的编撰，惯例上都是汇集单篇论文而成，这一次突破了旧有的方法，从开始就采取了以研究讨论为基础的共同参与方式。自丛书的主题、篇目，各篇间的相互关联，以至各篇文章的论旨，都经过每册作者讨论后才决定。初稿完成时，也经过切磋、问难，然后，再次修改定稿。所以，这套丛书并非过去旧有形式的论文集，而是具有主题、结构的集体创作。

有关文化史的研究，不论通史式的概述或断代式的专论，都不可避免的有其缺失。概述易省略其深奥与意涵，专论易疏忽其源流与发展。这套丛书则采取以问题为主的研究，完全根据问题的性质，或通贯而观，或断代而论。这种研究方式，保留了方法上的极大弹性，同时，也更容易彰显问题本身的性质，提出更周全的解释。以关于文学的两册为例，一册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间情爱的关注、幻想与神话，到智与美的融合，一共设计了六项我们认为能够充分表征中国文学传统的主题，给予系统性的解说，并讨论了文学的形式与意义、抒情精神与抒情传统。另一册则分别就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宋诗、咏怀、咏物、小说、戏剧等重要的文学类别加以论述。两者配合，相信不但突破了旧有的文学史形式，而且更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学史的内容。有关学术的一册，问题的选定则侧重每个时期的不同成就，从学术的萌芽到经学、注疏、理学、考据学，一一论列，以见学术的发展。关于制度与艺术的卷册则又注重各个不同的部

分或类别。制度的一册里讨论了皇帝、宰相、监察、选举、考试、史官、地方行政、君主教育等官僚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并申述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与历代政治改革的理想。关于艺术一册的内容包括了美学思想、青铜、玉器、陶瓷、雕塑、书法、绘画、文人生活工艺品、建筑等重要部分。

这套丛书既然是以问题为主的研究，自然而然，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一则反映了年轻一代学者的主要关心所在，一则想透过新问题表达新的解释观点。以关于思想的两册为例，讨论了忠、孝、仁、礼、公、私、仕、隐、常、变等传统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并作了新的阐释；同时也提出了理想人格、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德治与法治、儒家政治理想、法理依据、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均富理想、管制与放任、道德自主与社会约束、道德与政治、自然秩序与人文秩序、自然观念等新问题，赋予传统思想新的意义。借着尝试提出新解释，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更能显现出来。

然而，新的解释观点并非凭空杜撰而来，在这一点上，这套丛书特别强调广泛利用前辈学者的杰出研究成果，以此为根基，再作进一步的发挥。因此，钱穆、萧公权、李济、徐复观、牟宗三、杨联陞、屈万里、全汉昇、刘若愚、陈世骧、李剑农、赵冈、劳榦、张光直、余英时等等许多前辈学者的优异著作，都随时被年轻一代的学者所征引。这种现象除了说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到年轻一代学者的绝对肯定与尊敬外，更表示了处于变动之中的中国近代学术生命，在台湾的一脉相传，其意义自是无限深远。

尽管当时两岸隔绝，但各篇文章中，凡是论及根源，都运用了最新的地下考古材料来印证解说，根据最新的地下出土文物，分别从居址、器物、食粮、国家等方面，完整而清晰地描绘了八千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我们对先民活动起居的情形、食米（小米、稻米）吃肉（以猪为主的家畜饲养）的文明、上古社会形态的变迁、国家组织的出现，也就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特别是提出“满天星斗”

的上古文明的多元发展史观，更是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样性的了解。其他诸如讨论到地理环境、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人文思想、天下观念等问题的文章，也都能参证地下材料。

这套丛书自始即希望能涵盖较为广阔的文化活动层面。不可否认，近代历史教育过于偏重政治史，这使得历史教育的文化内涵，显得极其贫乏。这套丛书除了具备广为熟知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制度之外，更包含了以往较受忽视的社会、经济、科技、宗教、礼俗等层面。过去，对于中国科技史的了解，总是借助于英国李约瑟或日本薮内清的著作，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本与科技有关的专著，这也代表着年轻一代的科技史研究者踏出了一大步。在台湾，经济史是当时的一门新兴学问，年轻一代投入这项研究工作的，愈来愈多，相关经济的这本便是这些研究者所展现的成绩，分别从农业的自然环境、农业水利、新耕地的开发、土地分配、生产技术、商业、城市、货币信用、交通、海外贸易、财政税务等十一个方面，建构一部经济发展史。关于传统宗教，也选择了几个重要的问题来讨论。特别要一提的是风尚礼俗。近代以来，在对传统进行批判时，礼俗必定首当其冲，自命新派者，即清末所谓的“文明人”，弃之如敝履。然而，这套丛书中关于礼俗的则本着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探讨了祭祀之仪、婚丧之礼、长幼之伦、以及民间节庆、娱乐的文化意义，赋予这些传统礼俗一个新的文化生命，纳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中。

在简述这套丛书的编撰过程与内容特色后，作为当年的执行编辑，我非常高兴这套丛书在李安小姐的主持之下，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版，期待书中的观点能够对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有所助益。

2011年11月

目 录

i	总 序
	林载爵
—	
4	导 言
	黄俊杰
—	
10	天道变易·世运终始
	——历史思想中的发展观念
	林载爵
—	
50	立法之道
	——荀、墨、韩三家法律思想要论
	陈弱水
—	
68	仁与礼
	——道德自主与社会制约
	张端穗
—	
110	公与私
	——忠的伦理内涵
	刘纪曜
—	
134	骨肉相亲·志业相承
	——孝道观念的发展
	曾昭旭
—	
156	内圣与外王
	——儒学传统中的道德政治观念
	黄俊杰
—	
182	天人之际
	——传统思想中的宇宙意识
	蔡英文
—	
210	从役物到顺化
	——自然思想的分析
	卢建荣
—	
238	作者简介

传统中国思想家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自然秩序与人文理则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传统典籍所谓的“天人之际”这个问题。在“文化中国”丛书的《中国人的理想国》的《导言》里，我们曾提到宋儒常引用的《易经》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这句话言简义赅，意蕴丰富，千百载以下诠释不一，近代大儒马一浮先生的解释很有助于疏解本书的主题。马先生说：“天文即谓天道，人文即谓人道。阴阳消长，四时错行，天文也。彝伦之序，贤愚之等，人文也。”（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本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就是传统中国思想家对“天道”与“人道”这个问题的思考结果。本书所收集的八篇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个中心问题。

在传统中国思想中，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大致如何呢？尽管不同的时代或个别思想家之间会有若干出入，但是一般说来，传统中国思想家多认为自然秩序与人文秩序是和谐而非对抗的。中国文化中不会出现浮士德（Faust）。荀子所持“戡天役物”的说法也是在“天生人成”以及“明于天人之分”的脉络中提出的。传统中国思想家一贯认为：人道与天道有其感通之关系，天人并非断为两截。《诗经·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些文字都说明天命与人性之间有贯通的关系存在。而自然与人文之间可以透过德性主体而搭起会通的桥梁，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就是指此而言。中国思想家在这个基本认识之下，更强调人本身庄敬戒慎的努力。所以，在公元10世纪，宋儒对这个问题的辨析愈趋精微，注意到“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的对待消长问题之后，宋明儒也十分注意“功夫”的问题，主张人应努力于“存天理、去人欲”之克己功夫。

中国文化中这种天人合一的信念不仅见之于经典著作中，也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在先秦典籍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经典都讨论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尤其是《易经》与《春秋》。《易经》讲的是自然秩序的变化，但落实于人间现象，正是“以天道切人事”；《春秋》文成数万，

其指数千，讲的虽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但精微处则可说是“以人事反诸天道”。在传统中国的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可以体认中国人对“天人之际”这个问题的普遍关切。例如，中国人讲政治，必以“天与人归”为政权转移的根据；讲法律，则不外“天理人情”；讲社会伦理生活，则讲“尊亲配天”；中国的经济活动则是“利用厚生”，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来配合自然秩序的变化，以增益人类生活的资源。而中国思想的最高境界则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而“知心、知性”则可以“知天”。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对天人关系的关切，与《易经》、《春秋》等经典记载是互相呼应的。

在中国的学问领域里，受《春秋》影响最大的就是史学。中国史学所探讨的虽是世运兴衰、人物贤奸之类的人文现象，但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则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本书第一篇论文——林载爵先生的《天道变易·世运终始——历史思想中的发展观念》，就是探讨中国历史思想中天道与人道的变迁这个问题。林先生通论先秦至晚清中国的历史思想，指出中国史学家对变迁的看法兼具线状与循环两种形态。林先生指出“变”与“常”是中国历史思考的两个要项，这是很有见解的看法。传统中国史学家一方面垂迹以显本，求变以显常；另一方面则又立本以观迹，体常以尽变。传统中国史学家就在这种历史观之中安身立命，所以一方面既可免于“非历史的心态”（ahistorical mentality）的陷阱，一方面又能不堕入“历史相对论”（historical relativism）的险境。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思想传统，的确值得这一个苦难时代的中国人深思！

中国人对于人文秩序的安排虽重礼治，但是这并非意味中国没有法律。最近的考古成果证实：远在西周时代就已有法律的存在，而中国的法律思想也颇为发达。本书第二篇论文的作者陈弱水先生在《立法之道——荀、墨、韩三家法律思想要论》中，极力阐述荀子、墨子、韩非对于立法准则的思考。陈先生的研究指出：荀子与墨子都具有自然法的法理理论，韩非思想中的法律则无异于统治者来完成自己的目

的所作的理智思考之化身。但陈先生又提醒我们，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法律观念仍有两点共通之处：一、两者都肯定奠基于法律的安定秩序的价值；二、两者都没有明白区分法律与政治措施或命令。

任何涉及人文秩序的讨论，必然要牵涉到“群”与“己”之间的问题。中国儒家的一贯精神是内圣外王合一，成己成物不二，所以从己身的修养到群体生活的安排，是一种整合性的开展关系。从思想内涵来说，修身（己）的问题是以“仁”为中心而展开；群体生活的问题则是以“礼”为中心而展开。张端穗先生在本书第三篇《仁与礼——道德自主与社会制约》这篇论文中，对“仁”与“礼”这个问题有精当的分析。张先生在结论中指出：秦一统宇内，使礼的思想成为束缚人心的工具，幸赖许多知识分子对“道德自主”这个观念的信仰，使“仁”的思想一直有源头活水注入，发展日臻圆熟。

群己关系在思想上涉及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公”与“私”的问题。在本书第四篇论文中，刘纪曜先生环绕着“忠”的伦理内涵，来分析“公”与“私”这个问题。刘先生的研究告诉我们：春秋时代“忠”的伦理是对君臣双方的共同要求。但秦汉一统帝国建立之后，则“忠君意识”大为发达。因此，一旦皇帝个人私利与国家公利冲突时，君臣之间的困局就不可避免。但就历史所见，在这种困局中，知识分子选择“公忠”伦理的较为常见。

与“忠”的观念相对应的是“孝”这个观念。曾昭旭先生在本书第五篇论文中，详尽析论中国思想中孝道观念的发展。曾先生指出：汉代以后“孝”的伦理逐渐政治化而僵化变质，内在的德性自觉逐渐剥落而徒留其形式躯壳。“孝”的观念的发展与秦汉以降“忠”的观念的变质，基本上是互相呼应的，都与中国从先秦时多元的政治秩序走向秦汉以后政治权威一元化的趋势有深刻关系。

从第四、第五这两篇文字的论述，我们可以体认在中国思想及人文秩序中，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密切相关性。本书第六篇，拙作《内圣与外王——儒学传统中的道德政治观念》，即特就这个问题作初步的

探讨。笔者在拙文中说明：中国历代儒家以道德提升政治的理想，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常受到挫折，但是儒者抱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信念，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维持并发皇先秦时代孔孟所建立的政治思想体系，在遭受到政治权力的打击时绝不曲道以从人。这是儒学传统中最为光辉的一面，所以明末大儒王船山在那样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里，仍然对“道统”的延续充满乐观与信心。他在《读通鉴论》中告诉他同时代以及后世的人：“儒者之统，孤行而无待者也；……斯道亘天垂地而不可亡者也，勿忧也。”王船山纵览中国数千年来成败兴坏的轨迹，而培育出深厚的历史素养，所以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信心如此之坚定。这是值得这一代中国人特别深思的问题。

在前面的一般说明里，我们曾特别强调：中国思想家从不把天道与天道析分为二。本书第七篇，蔡英文先生的《天人之际——传统思想中的宇宙意识》于此节有精审的讨论。蔡先生指出：传统中国思想中的宇宙意识绝未在自然与人文之间切断其感通的关系。

中国思想家也常以自然解人文，本书第八篇，卢建荣先生的《从役物到顺化——自然思想的分析》就是分析中国思想家对于文化所抱持的态度。卢先生认为：就中国历史经验所见，对文化持否定态度者由老庄开其宗，而由唐末无能子畅其流；对文化持怀疑态度者则以王弼、郭象及张湛为代表；对文化持肯定态度者则以阮籍、嵇康为最著。因此，从卢先生的研究看来，中国思想家在肯定“天人合一”这个思想主轴之下，对于自然与人文之间关系的看法，显然是多样性的。

总结地说，从本书各篇文字的论述里，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传统中国思想家肯定天道与人道之间的相关性，所以他们在“天人合一”这个基础上会通形上问题与价值问题，使人有安身立命的立足点，也使人间秩序的各个面相都有妥善的安排。

天道变易·世运终始

历史思想中的发展观念

林载爵

时序缤纷

对于时间的流变，中国在先秦时代早有敏锐的感受，《诗经》中便

有“瞻彼日月，悠悠我思”^[1]的感叹，《摽有梅》

一诗，从“摽有梅，其实七兮”到“其实三兮”

到“顷筐暨之”，透过梅子成熟落地数量的增加

以至顷筐拾取，来描写一位女子感于岁月飞驰、

青春易逝而渴望求士的急切心理。《诗经》还发

展出了“昔我……今我……”的特殊格式，表达

主客环境的双重变化^[2]，如：“昔我往矣，杨柳

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3]“昔我往矣，黍

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4]屈原的《离

骚》更是广泛运用“时”字及其相关观念，朝、

夕、日、月、春、秋、年、岁等字眼不时出现，

在气象雄伟的诗篇中，充满了人面对永远变动不居的时间时的悲情^[5]，

如：“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

淹留”。这种千古共悲的情怀，古代的文学创作有着丰富的体认。

历史著作亦然，《左传》早已说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

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

也。”^[6]自然尚有变异，何况人事无常。这种变异是在今古之间呈显出

来的，于是历史的发展、时间的变动自然成为历代思想家关心的主题。

世变事异

在历史思想的范围里，历代思想家对于历史的变迁与发展的性质

均提出了分析和解释，首先便肯定了历史的变动性。

孔子在川上，感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7]孔子认为宇

宙不断地运转，时间无休无止地流逝，历史就像永恒的巨流，不停地

1.《诗经·国风·邶·雄雉》。

2. 孙康宜 “The Concept of Time in the Shih Ching”,《清华学报》新第12卷第1、2期合刊（1979年12月），页73—85。

3.《诗经·小雅·采薇》。

4.《诗经·小雅·出车》。

5. 陈世骧 “The Genesis of Poetic Time”,《清华学报》新第6卷第1期（1973年6月），页1—45。

6.《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7.《论语·子罕》。

奔驰。而这种发展又是进步的，他称赞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故从周^[8]，这表示他相信文化的累积与传承必然造成历史的进步，《雍也》篇说得更清楚：“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历史必然会变化，而在“至于道”的路途上，改革的行动又是必须的。

先秦历史进入战国时代，文化的大变动更加激烈，许多思想家在反省传统、展望将来之余，求变之心愈切。法家尤其显著，对于历史发展的变动性自然表达了最强烈的感受。商鞅至秦力主变法时，就与甘龙、杜挚二位大夫发生激辩，甘龙说：“知者不变法而治。”商鞅辩道：“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杜挚又说，治国无百倍之利，不变更法制，无十倍之功，不改作器物。商鞅答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并举“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等历史证据说明“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最后总结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9]明白肯定了历史的发展是变动的，制度在历史的变动中必然也要随着变革。

赵武灵王在位期间（公元前325—前299）为了强兵救国，欲行胡服骑射，公子成、赵文、赵造等一批公族大表反对，认为：“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知者不变俗而动”，行胡服就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赵武灵王则坚决表示：“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异。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所以“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历史的发展必然是“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故圣与俗流，贤与变俱”，“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10]。充分肯定了历史的变动性。

8.《论语·八佾》。

9. 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台北，华正影印本，1975年），《更法第一》，页2-3。

10.《战国策·赵策二》。